



苏联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研究

◎ 郝宇青等 著

Sulian Guojia Yu Shehui De
Guanxi Yanjiu



著名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31852

D751.25
15



苏联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研究

◎ 郝宇青等 著



Sulian Guojia Yu Shehui De
Guanxi Yanjiu

D751.25
15



北航

C1720174



著名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郝宇青等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华东师大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ISBN 978-7-5675-1723-3

I. ①苏… II. ①郝… III. ①苏联解体—研究
IV. ①D7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4211 号

华东师范大学新世纪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

撰 著 郝宇青等

组稿编辑 孔繁荣
项目编辑 夏 玮
审读编辑 崔 攀
封面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9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723-3/D·176
定 价 1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1 绪论	1
------	---

2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演进	15
----------------	----

2.1 西方学者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史	16
-----------------------	----

2.2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31
-----------------------	----

2.3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几种模式	45
------------------	----

3 苏联国家政权的建立	55
-------------	----

3.1 作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	56
-----------------------	----

3.2 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确立	64
-------------------	----

3.3 “党治制”成为苏联国家政权实际走向的结果	74
--------------------------	----

4 赶超型战略下国家职能的强化 91

4.1 实施赶超型战略的内外条件 92

4.2 赶超型战略的实施与高度集权体制的
形成 107

4.3 赶超型战略的社会后果 113

5 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 139

5.1 国家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及其
表现 141

5.2 国家控制社会的手段 158

5.3 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形态 179

6 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和冲突 187

6.1 社会同质化背后的社会分化 187

6.2 不被承认的社会分化与现实政治的
扭曲 198

6.3 “小社会”的反抗 204

7 结语:对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思 219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42

1 绪 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旨在救治资本主义弊病和探寻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走向的科学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共产主义将首先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英、法、德、美等几个西方主要的国家取得胜利。而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正是因为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顶点为起点的。恩格斯即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①这一认识也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然而,世界历史的演进并没有按照理论的规定进行,实际情况则呈现出特殊的进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却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立了起来。对于俄国这样一种非常规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2页。

社会制度的演进,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就承认: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毫无出路”的情况下,俄国甚至在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的情况下,而不得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说道:“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寻常的条件吗?”“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他进而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

可以说,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明的道路,即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②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正是这种“跨越”,在事实上却给本不应成为问题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冲突和烦恼。

从理论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应当是处于不断弱化的状态之中,以至于最后将“自行消亡”。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国家理论中就明确阐明了这一点。例如,恩格斯在《家庭、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②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队的最大羞辱。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并且卡夫丁峡谷成为了“耻辱之谷”的代名词,卡夫丁峡谷也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7页。)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就明确指出,“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① 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一思想,他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虽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但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②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半国家”了。^③ 因此,按照理论的推演,一旦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之后,国家就会随之弱化,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大国家”的,即使需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也是为消灭国家做准备的。但是,从实践上看,或许正是由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天不足,在苏联恰恰造就了一个“大国家”,而“大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制度供给过剩,以至于挤占了社会的空间,因而“小社会”的状况也就势在必然了。因此,一方面我们在苏联那里基本上看不出国家“自行消亡”的迹象,相应地,另一方面也看不到社会自主性增强的空间和可能。英国学者阿兰·斯威伍德曾对苏联的“小社会”发表如下评论:在苏联,“社会大众温驯如绵羊、柔顺如杨柳。所有的独立而自主的团体与个人,如果还没有被国家机器收编,就是已经被国家机器所摧毁”。^④ 一言以蔽之,苏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大国家,小社会”的状况,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130页。

③ 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2页。

④ 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引论第3页。

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而这一事实,不能不说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倒置。

对于苏联“大国家,小社会”的事实,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合理性可言,例如,苏联利用强大政权的力量,^①并借助于严格的计划体制的制度安排,不仅迅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而且在1928—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中,就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并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化国家。这些似乎证明了“大国家,小社会”模式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必须认识到的一个情况是,这种合理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苏联内外环境的变化,由于“大国家,小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变,造成了“制度供给过剩”的不良后果,^②因而其存在的合理性渐渐丧失,国家制度的构造渐渐变形,功能也渐渐异化,以至于到最后则衍变成成为阻碍国家自身发展和社会成长的重要因素。正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协调,笔者认为,这构成为导致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

自1991年以来的20多年间,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苏联解

① 有时候甚至是暴力和恐怖,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即曾指出:“在任何不成熟到需要革命的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化,不但有中断法律连续性的意思,而且有随即出现恐怖统治的意思。”(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40页。)

② 所谓制度供给过剩,是指没有必要的或多余的制度供给。在苏联高度集中的制度运作过程中,往往表现为制度不仅涉及宏观调控领域,更涉及微观而具体的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管得太多”,说明制度供给过剩,而“管不了,管不好”,则说明制度的低效(甚至有的制度是无效的、乃至负效的)。可见,繁多的制度等于没有制度。这反映了制度供给过剩的另一面(或者其结果)就是制度供给的不足。

体、苏共败亡原因的探讨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发表。总体而言,学者们关于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原因的认识主要有如下观点^①:

“葬送说”——部分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这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乱党乱国的罪魁祸首,是他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此时的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与此相关的观点还有所谓的“平庸论”。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迅速走向衰亡。

“意识形态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舆论的失控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在苏联改革过程中,舆论的失控不断瓦解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摧毁了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从而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

“民族矛盾说”——苏联解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苏联民族关系

① 主要参阅李永忠、董瑛:《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人民论坛》2012年第6期;程恩富、丁军:《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12-07-02。

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苏联是一个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而且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分裂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为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契机,最终将统一的苏联引向了分裂。雷日科夫就认为:“20 世纪的大部分岁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指民族关系——笔者)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①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因而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满的结果。

“上层自决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就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 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 80 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

① 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17 页。

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①因此,苏联解体可以说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改革失败说”——不少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造成的。这主要包括三种看法:(1)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2)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苏联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当时的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从而最终导致苏联发生剧变。(3)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为首的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指出,自己在担任苏联主要领导人期间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如果能及时实行改革,那么,局面可能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其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斯大林模式说”——不少学者认为,苏共败亡、苏联解体的主要根源在于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并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

^① 参见2000年5月17日和5月24日大卫·科兹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参见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的著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了苏共败亡、苏联解体。还有另一种与“斯大林模式说”相反的观点,即“非斯大林化说”。这其实可以看做“斯大林模式说”的变种。这一观点认为,苏共败亡、苏联解体是由于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反对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说,“斯大林模式说”的支持者为数不少。当然,这一观点最根本的归结到了体制之上。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①

“三大垄断说”——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败亡、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指出:“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

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认同和接受了久加诺夫的这一观点。

“党群疏离说”——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导致了党群、干群关系的异化和疏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流失,以致落得个亡党、亡国的结局。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于1990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有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人民群众是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而当它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的灭亡。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腐败亡党说”——有学者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就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①我国不少学者认同这种观点。

“和平演变说”——这种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西

^① 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区亚娥译,《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合刊。

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强化了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观和执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苏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早在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40多年后,苏联便解体了。

“军备竞赛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军备竞赛,这给苏联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拖垮了苏联。这种观点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用于扩军备战,与美国等开展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这不仅导致国防军事开支猛增,而且也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历史合力说”——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损害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危机、经济一体化危机、共产党内部危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政策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竞争危机、精英蜕变的危机、军备竞赛危机、西方的干预危机,等等。只有把多种因素综合起来,才能真正找到解释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合理原因。

应当说,上述的各种解释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原因的探讨,均有其合理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些观点当中也是多有争论的,其中有些观点存在着偏颇之处,是大可商榷

的。当然,笔者在这里无意介入这些争论,只是想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苏联政治的发展与变迁,进而从另一视角透视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原因。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苏联政治的发展与变迁,进而透视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原因,虽然称不上理论上的创新,但在国内学术界,从这一理论视角对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原因的研究并不多见,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因此,在2005年笔者以“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并获得立项。在获得立项后,尽管笔者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繁琐的行政管理工作,但时时刻刻不敢有所懈怠,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着思考和研究,撰写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当然,笔者并不敢因此贸然说本项研究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而是觉得这一研究主题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和重视。这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笔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动力。同时,笔者在这里要申明的一点是:对苏联解体、苏共败亡这样的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可以有多种视角加以研究,而本项课题只是通过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苏联政治的发展与变迁,进而透视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原因的一种尝试。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曾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探索,让我有机会在旧的土地上走过新的道路,用新的眼光去看旧的景象,用不同的音阶去听旧的声音,为一些老问题找一些新的答案。”^①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研究苏联问题的一种心境。如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就这一问题向读者提供一些有益

①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的见解和启发,能够就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作一点深化,那么,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就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意义而言,列宁下面的一段话则可以看作是很好的说明,他说:“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解决自己的任务。”^①毫无疑问,苏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领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通过对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仅对于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而且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对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也如列宁所说:“从经验中,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执掌政权。”^②

最后,笔者想就本课题的研究方法和篇章结构作一简要的说明。

关于研究方法。

应当说,对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的方法论,力求做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时间和空间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宏观和微观的统一,以有利于全面、完整和准确地把握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涵,有利于深入分析苏联国家与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6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